

中国近代武术竞赛的思想进路、价值取向与实践逻辑

崔浩军¹，张君贤²，刘洪³，王震¹

(1.上海体育大学 武术学院, 上海 200438; 2.集美大学 体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3.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基础教学部, 上海 201514)

摘要：中国近代武术竞赛体系的形塑过程，既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觉醒，又映射出身体政治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刻关联。在思想进路上，构建了以“启”为核心双重逻辑：一方面通过“身国一体”的竞赛设计，将个体身体规训与国家命运相联结，形成情绪动员与认知重构的思想粘连；另一方面以“民族体育”为框架调适传统武术与现代体育规则，实现文化主体性与时代适应性的辩证统一。价值取向上以“强”为引领展开三重维度：“擂台赛”通过对抗性竞技重塑国民形象，消解“病夫”的污名化标签；“国术考”建立标准化考核体系，以身体技术甄别并强化国家人才；“运动会”中的武术展演则通过视觉化呈现塑造“健夫”形象，构建身体政治的象征符号。实践逻辑遵循“行”的路径，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全民性与精英性互动、竞赛规则的中西规则融合创新、尚武精神与国家认同的价值互构，形成从个体技术操演到民族精神培育的转化机制。

关 键 词：近代武术；武术竞赛；擂台赛；国术考试；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5)04-0023-08

The ideological trajectory,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modern martial arts competition in China

CUI Haojun¹, ZHANG Junxian², LIU Hong³, WANG Zhen¹

(1.School of Wush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3.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Shanghai Zhongqiao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514, China)

Abstract: The shaping process of competition system for China's modern martial arts not only embodies the subjectivity awaken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but also reflects the profound connection between body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 and country.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approach, a dual logic centered on "awakening" is constructed: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the competition design of "body and nation as one," individual body discipline is linked with national destiny, forming an emotional mobilization and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of thought; on the other han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 sports,"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and modern sports rules are adapted to achieve a dialectical unity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adaptation to the times.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concept of "strength" unfolds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arena competition" reshapes the national image through confrontational sports, dissolving the stigmatization of the "sick man" label; the "national martial arts examination" establishes a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system to identify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s talent through physical techniques; martial arts performances in sports games, by visualizing the presentation of martial arts, help to shape the "strong man" image and construct the symbolic signs of body politics. The practical logic follows the path of "action", manifes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ss participation and elite engagement, the fus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etition rules, and the co-construction of martial spirit and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forms a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from individual technical practi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Keywords: modern martial arts; martial arts competition; arena competition; national martial arts exami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2024 年 3 月 29 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召开专家调研座谈会时,有专家指出“竞技武术套路……偏离了武术攻防的本质”^[1]。2021 年《“十四五”武术项目发展规划》意见和建议的公告》中也明确指出“武术套路舞蹈化、体操化现象严重,散打技法民族特色不明显”^[2]问题。回顾相关研究发现,在中国武术竞赛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能否比、比什么与怎么比的现实问题。如邱丕相^[3]曾指出,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用西方体操的办法改革武术”;马明达^[4]也曾批判这一现象为“花拳入门错了一生”;杨建营^[5]则将其进一步归结于“20 世纪后半叶‘扣错了第一粒扣子’,即表演性套路取代了原本作为传统武术之主体的技击对抗类武术”。而为了进一步求解竞赛问题,学者们纷纷站位近代中西体育观念交流之肇端,反思中国武术“体育化与标准化”^[6]之发轫,探究“从实用技击术向现代竞技体育转型”^[7]之序幕。

“古方”能否治“今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分析框架虽揭示了近代武术竞赛的双重变革路径:一是因屡次败刃于疆场、失利于谈判带来的持续冲击,将国家危机具象为“病夫”的身体症结,推动武术向竞技化、标准化转型;二是强身话语下的竞赛回应,试图将武术重构为培育“新民”、实现“救亡”的文化装置。但这种解释框架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其不仅将武术现代化简化为对西方体育范式的被动模仿,更遮蔽传统武学“体用兼备”的内生性演进逻辑。诚如习近平总书记^[8]所言:“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在不断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今天,摆脱西方中心视角下的武术竞赛发展模式,反思武术“体操化”论断,仍然需要在“去‘病夫’的文化逻辑起点”上^[9],坚持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以及对“真”的批判与发展。熊晓正^[10]曾指出,近代“土洋体育之争”使中国最终获得“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可以说,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并非惰性十足,只接受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觉^[11]。所以,本研究是以中国为主语的近代武术竞赛命题,在“身国一体”的思想基础上,追问其思想进路以考察竞赛目的,反思其价值取向以探究竞赛意义,考察其实践逻辑以关照“今病”。

1 以“启”为核心:中国近代武术竞赛的思想进路

经由国家“病夫”的身体话语转向,近代“六不如夷”^[12]和“百事不如人”^[13]的社会心态通过国民身体而具像化的显现,此时的身体作为待启之蒙而备受关注。社会精英“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14],整饬“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15]的思想也开始在社会弥漫,以武术竞赛激励、教化和团结人民,宣传、交流和展示国家形象的创新道路也开始被设计。

1.1 情绪与认知的思想粘连:中国近代武术“身国一体”的竞赛设计

在近代中国的时间线中,“种争”与“国战”愈演愈烈,“文弱之民”也被打上“东亚病夫”的身份标签,“中国不但是‘病人’,还是‘死人’”^[16]。屈辱和愤怒情绪在社会中不断弥漫,也引起更广泛反思:严复、康有为等提出了“以力强体”的主张,引起“鼓民力”的社会思潮;蔡锷、蔡元培等提出了“以体强兵”的主张,引起了“军国民体育”的社会思潮;孙中山、张之江等提出了“国术救国”的主张,引起了“尚武救国”的社会思潮;恽代英、毛泽东等提出了“以体增质”的主张,引起了“健康第一”的社会思潮。在当时的社会精英眼中,“病夫”之体不再一无是处,它成为了“民族再生”^[17]的重要平台。当“一国之盛衰……定于国民身体之强弱”^[18]成为近代体育的洞察时,重新设计一套“强身-强国”的运作模式则成为精英们的共同追求。可以说,国人面对“病夫”身体与身份的双重焦虑,屈辱情绪的涌动中隐藏着更广泛的“身国一体”认知转变(见图 1)。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身国一体”理念滥觞于《礼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述,经由个体生命伦理与政治治理秩序的本体论同构形成“以身为度”的具身化范式,最终凝练为“身国互喻”的文化传统,彰显出东方治理独特的身体政治哲学智慧。近代以降,这种身体观在共识性危机中转化为具象化的实践诉求,武术竞赛也不再单纯的指运动员个体或运动队之间的竞技,它更多包含着“身体”社会文化功能的仪式化呈现及其影响机制的实际运作。例如,在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考试中,会场悬挂“强国雪耻基于此举、卫国卫民、不强则亡、武术是国人的基础”将国民观念与现代竞技场域有机融合;现场分发“中

央国术馆画报、国技周报国考号、敬告民众书”^[19]宣讲总理遗教, 解读国考目的, 提倡习武行为, 建立身体实践与国家象征的符号关联。

此外, 对于竞赛目的与意义的探寻, 也促使竞赛活动中人员、技术、规则、组织、理念及精神等要素发生转变。其一, 在霍元甲、王子平、朱国福、蔡龙云等中国拳师对战西洋力士的竞赛叙事中, 擂台比武已然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角力场。其二, 第三届全运会首次引入“国技表演”, 暴露出传统武技与现代体育在价值维度上的深层张力。当运动员的足球、篮球、网球与拳师的刀、枪、剑、棍同时存在于国人的集体想象中, 运动会已然成为武术现代转型的微观战场, 而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武术队的表演, 更预示着竞技场正从民族主义的宣泄口转变为文明对话的展演台。其三, 随着“国术科学化”改革, 竞赛体系开始呈现

中西融合态势。从第1届国术考试“不分年龄大小与身体重量”^[20]的擂台旧制, 到第2届国术考尝试引入体重分级、护具防护等新规, 映射出民族体育建构进程中的文化博弈。拳师们褪去长衫穿上护具的过程, 实则是从“江湖规矩”向“契约精神”的艰难蜕变。

值得注意的是, 近代武术竞赛理念的嬗变始终与社会思潮共振。“天足运动”打破传统禁忌, 才有了第3届全运会中女子舞刀的盛况; “土洋体育之争”诞生的“国术科学化”, 则试图唤醒“尚武”文化基因的同时, 也激活了多样化的武术竞赛模式。通过擂台赛、运动会、国术考等不同竞赛模式, 战胜洋人证明种性之优的心理, 打败对手昭彰体征之强的行为, 强健体魄表征国力之盛的目的,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经历着深刻解构与重构。武术竞赛早已超越单纯的胜负之争, 成为检视国民体质与精神气象的立体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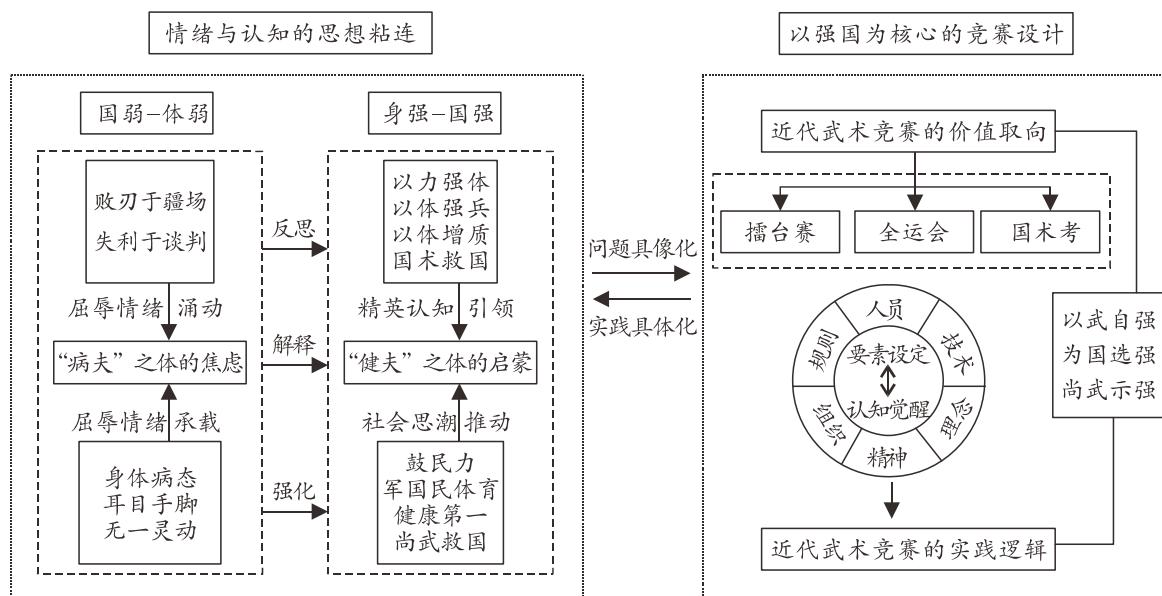


图1 情绪与认知的思想粘连: 中国近代武术“身国一体”的竞赛设计

1.2 传统与现代的相互融合: 中国近代武术“民族体育”的竞赛思维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 强与弱、优与劣的巨大转变与落差, 迫使国人祈求寻觅一条兼容中西、和合古今的“身强则国强”之路。而“请自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 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21]的实质是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激活传统资源的策略性选择。对此, 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 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西方体育, 并获得“衡诸国家御侮之需要, 普及国术, 尤为当今之急务也”^[22]的新认知, 产生了“将洋土体育打成一片而创造成为中国的‘民族体育’”^[23]的新思考。

同时期日本“大和魂”武道改革运动形成了跨文明参照。同样面对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特殊困境, 既要应对奥林匹克主义的普遍化压力, 又需维系本土身体文化的阐释权。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既表现出文化自卫的普世困境, 又呈现出了文化调适的特殊智慧。

“民族体育”的建构过程亦导致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祛魅, 其招法、劲法与练法等需要在竞赛规则的监督下进行实战检验。范振兴^[24]运用人体力学解构武术技击, 但其“遵循生理构造”原则与“丹田运气”传统功法形成知识论冲突。张之江强调“非重比赛, 无以判优劣竞进”^{[25]113-114}, 陈奎生^[26]主张“欲知彼此技术

之高下,故比赛尚焉”,实质是西方竞技理性与传统武术体系的交融。通过竞赛规则的标准化设计,近代武术将“体用兼备”^{[25][61-62]}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现代竞赛方式;借助“套路演练+实战对抗”国术考结构的创设,既规避了武术现代化过程中“打练分离”的技术割裂,又摆脱了武术简化为身体“操演术”的命运。通过标准化竞赛规程的全国推行,既限制地方性武术“结私党、造派别”^[27]的封闭性,又借助全国性武术竞赛“融化门派、破除畛域”^{[25][37]},重塑出“中华武术共同体”的想象。

可以说,中国近代武术竞赛的兴起,本质是对“尚武救国”时代命题的回应。在科学理性与传统智慧、个体强健与民族复兴、文化守成与现代转型的张力中,武术竞赛成为身体治理与精神重构的实验场。面对当下武术入奥争议中的“标准化与本真性”之争,实为“民族体育”命题的当代延伸。历史经验表明,民族体育建构不应是封闭的文化本质主义,而需在“发明一调适一再发明”的动态过程中,实现从“作为中国符号的武术”向“具有现代生命力的中国武术”的认知跃迁。

2 以“强”为引领:中国近代武术竞赛的价值取向

鉴于“病夫”之体向“健夫”之躯的身份诉求,“体力”之强向“国力”之兴的话语引领,促使中国近代武术竞赛开启了以“强”为引领的价值取向。

2.1 以武自强:“擂台赛”中的“病夫”反击

“病夫”^[28]一词虽源自国人的自嘲、自励与自警,但通过“擂台赛”的对手映衬,其反击的矛头直指身负“侵略者”标签的外国拳师。他们人高马大、态度傲慢,出场时带着对国人“病夫”形象的不屑与嘲讽。中国武师一般是为维护国家与民族形象而被动反击。最终以西洋拳师惨败,中国武师完胜(体型上以小博大的胜,行为中光明磊落的胜)的结局落幕。在“张园打擂”的竞赛叙事中,1909年霍元甲与奥皮音的未竟之战,虽因规则分歧止于表演(《申报》1909年12月5日载“演技飨观众”^[29]),却在媒体叙事中升华为“病夫”反击的民族寓言。通过《时报》“备其洋彩、签订生死,创中外力士竞赛之先河”^[30]的渲染,将擂台比武转化为东西文明的较量。层累造史中的精武英雄大致经历:1909年《申报》仅视其为“献技武师”,与张园表演者并列的媒体初构;1913年胡寄尘在《记霍元甲逸事》^[31]中植入“异族猖獗”叙事与“某国人毒害”情节,完成悲剧英雄塑造的文学升华;1916年萧汝霖通过《大力士霍元甲传》《述精武体育会事》等,将霍氏塑造为“尚武救国”的精神图腾。这种层累过程

实为民族危机下的集体心理投射,反映社会对“身体雪耻”的迫切需求。尽管“霍元甲大战奥皮音”史实存疑,但其价值导向不容忽视。一方面,他为中国拳师提供去除“病夫”污名的行为参照。当《申报》以“128磅 vs 160磅”“约高五六寸”的数据标注朱国福为“竞武场开办以来华人首次击败外人”^[32]时,拳击规则下的“公平竞争”,反被转化为论证中国武术优越性的实证武器。另一方面,当霍元甲形象从武师升格为民族魂,擂台也不再只是较技之所,而成为重写“身体-国家”关系的文化装置。想象的共同体需要具象化的殉道者,霍元甲传说的流变,成为近代中国构建武术文化主体性的身体诗学。

2.2 为国选强:“国术考”中的“身体”甄别

20世纪初,随着武举制的废除(1901年),中国传统“以武入仕”的晋升机制戛然而止,武术从“庙堂之器”沦为“江湖之术”。中央国术馆通过创设“国术考试”制度,并以“本馆创行国考,可称武科开考之权舆”的官方叙事,打破“所考仍囿于文之一途,而武术不与也”^[33]的单一选材模式。究其本质是以层级化选拔取代科举制的仪式性展演,通过“县考-省考-国考”三级体系,将散落民间的“武勇之身”纳入国家人才网络。1928年举办的首届国术国考吸引来自17个省市的333名选手,1933年的第2届国术国考进一步扩大至21个省市的438名选手,参赛人数和地域覆盖范围显著增加,最终促成“来宾数万人,自晨至暮,兴趣百倍,饥渴俱忘”^[34]的热烈。此外,国术考的仪式性建构远超体育竞赛范畴。军政要员的集体出席与300多名拳师的刀枪剑棍,形成权力与身体的视觉共谋。更关键的是竞赛规则的意识形态编码,通过笔试内容将孙中山“尚武精神”具象化为“三民主义试略,卫生为人生必要试略,中国国术起于何时试举所见”^[35]等考题。两届国考通过“对抗为主、套路为辅”的选拔标准,推动了技术甄别与人才流动的现代转型。据《中央国术馆史》统计,国术考中的获胜者,最后大多奔赴祖国大江南北从事武术教学传播,更有甚者远赴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郑怀贤、张文广、温敬铭、何福生等更是成为新中国武术事业建设的中坚力量^[36]。可以说,国术考通过“技术考察-意识形态-人才流动”三重机制,完成从传统武举到现代身体治理的范式转换。

2.3 尚武示强:“运动会”中的“健夫”展演

“健夫”是严复眼中“手足体力”充足,“壮佼长大,耐苦善战”之国民^[37];是梁启超^[38]笔下“尚武精神”张目,“动荡其血气,发扬其身体”之新民;是毛泽东^[39]心中“身体第一性”发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之人民。而在中国近现代大型赛会中,以武

术为手段的“健夫”,成为提振民族精神、展示强国形象的重要载体。1924年第3届全运会首设武术表演,通过视觉化编排将武术审美化与政治化,使“健夫”形象成为民族复兴的具象符号。其评价体系的设计则极具深意,个人演练以“身、手、眼、步法、精神、气、力、功”八要素为评判标准,团体演练强调“秩序、精神、姿势、气力、服装”^[40],暗合国民教育的纪律诉求。至1933年第5届全运会,“国操”更名为“国术”,增设“拳术、摔角、器械、弹丸、射箭、踢毽子、测力等7项锦标项目”^[41],更以“京师2360名小学生”^[42]太极拳方阵构建集体身体景观,“健夫”叙事从精英话语向大众文化的渗透。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中国代表团首次以“国术表演”形式在国际体育舞台集中展示武术,成为近代中国通过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民族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标志性事件。柏林奥运会正值纳粹德国宣扬雅利安人种优越性之际,中国选择在此展示武术,以身体为媒介展开文明对话,通过国术适应性、艺术性、经济性和实用性四大优点^[43],展示强健美观的体格,寄意撕破“病夫”之标签。从展演效果看,西方媒体惊叹“谢幕十几次”^[44]的盛况,德国体育专家丁克总结出“艺术-韵律-尚武”^[45]的价值内涵,而《申报》通过“中国武术兼具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46]的定性报道,将“健夫”展演转化为民族自信的佐证。近代运动会的武术展演,在祛“病夫”与造“健夫”的张力中艰难前行。

3 以“行”为路向: 中国近代武术竞赛的实践逻辑

近代武术竞赛的实践逻辑以“行”为路向,通过“主体之行”的全民动员、“方法之行”的中西调适、“价值之行”的精神重构,构建起一套服务于民族救亡的综合性行动体系。

3.1 主体之行: 全民参与与精英主导的双向互动

近代武术竞赛的实践主体呈现出“全民参与”的理想与“精英主导”的现实交织,二者共同推动武术从“江湖之技”向“强国之术”转型。这既体现在社会动员的广度突破,又展现为权力结构的深度渗透,最终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下达致动态平衡。在全民参与的维度上,武术竞赛通过性别与年龄的解禁实现社会基础的拓展。以1936年柏林奥运会“剑术”的女性展演为例,女性武者以强健体魄重塑“国民母体”^{[27][79]}形象,既消解“病夫”的标签,又呼应“母强大”^[47]的优生活语。“童子军”的身份转向,促使儿童被纳入到武术竞赛体系之中。例如,在1919年的第7届华北运动会上,阳曲两高等小学童子军表演游戏,

陆军步十团技术连表演“新武术”。而在《佛山精武月刊》中记载,童子会员更是可以承担宣讲“游艺纪念会”^[48]的职责。1928年的国术考,更是出现了下至学步幼童上至花甲老人均争先参与的盛况^[34]。权力与资本的共谋则强化了精英主导的合法性。社会精英通过政治资本(张之江以陆军上将身份推动国术考试)、经济资源(陈公哲斥资修建精武会场馆)、文化声望(孙中山题写“尚武精神”)三重路径主导竞赛。全民参与为武术竞赛注入民主基因,使其突破传统门户之限;精英主导则通过制度建构将零散的民间武师收编为国家所用。二者在“尚武救国”的目标下形成共生关系:当童子军的国操表演与中央国术馆的标准化评分共存,当女性武者的身体展演与精英制定的国文考试并行,武术竞赛便成为传统与现代、草根与权威的角力场,而正是共生关系推动着武术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重构。

3.2 方法之行: 技术规则的中西融合与本土创新

近代武术竞赛的技术规则呈现出“传统技击科学化”与“西方体育本土化”的双向调适,形成独特的实践路径。第2届国术考试标志着近代武术竞赛标准的全面成熟,其通过“技术规范-禁用条例-评判细则”三重架构(见第28页表1),将传统武术的劲力原理转化为可操作的竞赛规则,不仅实践了张之江“科学化改良武术”的理念,更推动了传统武术从民间技艺向现代体育项目的关键转型。

技术分类的谱系化重构,将传统武术拆解为拳、枪、刀、剑、棍五大技术模块,每种器械对应独特的劲法体系。拳术强调弹力抖劲与搠捋挤按的太极八法,通过掖掌、探掌、缠掌等虚实转换展现内家特质;枪术以黏连粘随为核心,在拿、拦、挫、崩间实现刚柔互济;刀术追求刚柔突变,以劈砍扎撩的动态平衡演绎“刀如猛虎”的美学;剑术讲究精准控制,斩刺绞挂中体现“剑走轻灵”的哲学;棍术则通过阴阳把位转换,在扫劈挑截间达成“棍打一片”的空间掌控。劲力美学通过双重否定确立评价标准,正面要求“暗劲化劲”“刚柔相济”的劲力呈现,反面严禁“专使蛮力”“完全断劲”的身体表达。如拳术对抗中,扁踹高踹需伴随探掌托撩形成劲力闭环,禁止无技术逻辑的胡打乱击;枪术对抗规定“硬撑软拦”的辩证用力,排斥棒扫式的力量滥用。技术异化的防范机制则通过3层禁令筑牢传统边界:首要禁止违背拳械原理的技术移植(如枪术禁用棒法、刀术禁行短兵技法),次则杜绝力学逻辑混乱的拼斗(如剑术乱击、棍术乱扫),最终否定缺乏劲力转换的断劲行为。当出现同分争议时,裁判优先考量劲力质量而非胜负结果,使武术竞赛成为传统身体智慧的展演场。

表1 第2届国术考试传统拳械对抗规则^{[49]23-29}

项目	技术规范	禁用条例	评判细则
拳术	拳术对抗时,以弹力抖劲、棚、捋、挤、按、采、捌、肘、靠、突、横,挂打、掖掌、探掌、缠掌、托撩、扫躺、扁踹、高踹等,亦虚亦实,明确施展,暗劲化劲者,为合法之标准	使蛮力,不按拳法,不合力学,违背拳理,胡打乱击,一味拼斗完全断劲者,在所必禁	先击中或踢中者;三点着地;故意避斗;犯规行为
枪术	枪术对抗时,以拿枪、撑枪、拦枪、挫枪、进枪、劈枪、斩枪、粘枪、撸枪、标枪、勾枪、剔枪、崩枪、挂枪、带枪、穿指、穿袖等,硬撑软拦,黏连粘随,刚柔相济,明确施展,为合法之标准	专使蛮力,不按枪法,不合枪理,改用其他器械之法,违背枪学,用棒横扫,一味拼斗完全断劲者,在所必禁	先刺中或击中者;器械落地;故意避斗;犯规行为
刀术	刀术对抗时,以劈、刺、砍、扎、撩、剪、托、摔等,忽刚忽柔,明确施展,完全暗合化劲者,为合法之标准	专使蛮力,不按刀路,违背刀理,或用其他短兵之法,一味胡乱劈砍完全断劲者,在所必禁	先后劈、刺、砍、扎,以及其他刀术之着法击中者;器械落地;故意避斗;犯规行为
剑术	剑术对抗等,以斩、砍、撩、刺、绞、挂、剪、挑、点、截及其他剑法,刚柔相济,明确施展,完全暗合化劲者,为合法之标准	专使血气之勇,不按剑法,违背剑理,或用其他短兵之法,一味胡乱打击,完全断劲者,在所必禁	先后劈、刺、挑,及其他剑术之着法击中者;器械落地;故意避斗;犯规行为
棍术	棍术对抗时,以扫棍、反拿、缠拿、张棍、劈棍、甩棍、剁棍、截棍、剪棍、挑棍、阴把、阳把,虚实刚柔,明确施展,完全合棍之法者,为合法之标准	专使蛮力,不按棍法,不合棍理,或用其他长兵之法,违背棍学,一味乱击者,在所必禁	以先击中者;器械落地;故意避斗;犯规行为

武术套路表演规则体系的构建,旨在通过科学化、系统化的评价标准,引导武术技艺的规范表达与文化传承。其核心逻辑围绕技术标准化、文化内涵挖掘与竞技公平性三大维度展开,针对不同表演形式的特点进行差异化设计(见表2)。

表2 第2届国术考试套路表演规则^{[49]29-30}

规则维度	单人拳术表演	单人器械表演	对手表演
核心标准	手、眼、身、步、法	手、眼、身、步、法	功力、精神、劲路、姿式、态度
技术细则	臂、掌、拳、眼、身、端、踢、根、式、法、呼吸、气力、生熟	臂、掌、拳、眼、身、端、踢、根、式、法、呼吸、气力、生熟	手、掌、眼、身、步、端、踢、根、式、呼吸
重点事项	侧重拳理劲路的考察	器械方法适合器械原理,以刀代剑,以棍代枪等类减分	拳械方法及攻者守者精神,符合拳械原理;比较两方之巧拙、迅速、动作生熟,判别增减其分数

在单人拳术表演中,规则聚焦于“手眼身步法”的协调统一,将传统拳理融入动作细节评价。如通过臂、掌、拳等13项技术细则的分解,要求演练者不仅完成肢体动作,更需体现“拳势呼吸”的内家要义,使冲拳踢腿间蕴含腰马合一的劲力表达。单人器械表演则突出器械特性的专属性,制定器械误用扣分机制。如以刀代剑、以棍代枪类动作将直接影响评分,以此维护“刀如猛虎、剑法灵动”的器械本质。对手表演既考察单方的劲力饱满度与招式准确度,更注重攻防

转换的实战逻辑,要求攻击动作具备有效攻击距离,防守闪避遵循传统“闪转腾挪”原则,通过双方动作的时空配合度与应变能力进行双向评分,使表演既具观赏性又不失技击内涵。

3.3 价值之行: 尚武精神对国家认同的构建

近代中国尚武精神与国家认同的互动,是一场以身体为媒介、以传统武术为资源、以竞赛为场域的民族精神重构运动。在身体改造层面,这一运动以“从病夫到健夫”的体格重塑为核心逻辑。霍元甲擂台神话的建构,将武术对决升华为民族竞争的隐喻,其击败西洋力士的叙事成为洗刷“东亚病夫”之耻的象征性战场。中央国术馆推行的国术考试标准化,实质是以科学化考核体系将民间武技纳入国家治理框架,而张之江提出的“术德并重”原则,既保留传统武术的技击内核,又注入“强国强种”的现代意识。在符号重构层面,传统武技通过现代性转译升华为民族文化符号。近代武术竞赛通过规则制定、技术分类和评判标准,将庞杂的传统武技改造成可展示、可传播、可比较的现代文化符号。国术表演融入全运会与奥运会,擂台比武升华为民族文化展演剧场。孙中山“恢复固有地位”的号召在此过程中被具象化为“与列强并驾齐驱”的身体实践。在治理技术层面,国家权力通过微观渗透构建起规训网络。“标语—国旗—总理像”的视觉等级设计,则使赛场成为权力的微缩模型,选手鞠躬时的凝神屏息再现“仰望权力”的意识形态灌输。四级称号体系(国士、壮士、武士、勇士)^[22]作为符号生产机制,既是技术等级标尺,更是国民身份认证。可以说,通过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激活,在抵抗殖民

话语的同时实现国家认同的构建, 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提供超越“冲击-回应”二元对立的实践范式。

4 结语

在“以西释中”成为中国武术竞赛实践的主流时, “以中释西”重构中国武术竞赛理论也是理所当然。处在这个变革不断、多元并存、万物互联的全球化时代, 武术竞赛不仅承载着个人、群体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诉求, 而且也反映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水平。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武术竞赛现代化运动, 最终在理念层面有着三重趋向: 从证明种族优越性的狭隘对抗, 升华为展现人类潜能的公平竞技; 从彰显武力的身体展演, 转化为追求卓越的自我突破; 从民族存亡的沉重隐喻, 蜕变为文明互鉴的轻盈纽带。正是这种理念的迭代, 使得在民族体育的现代化进程中得以跳出“雪耻型民族主义”的窠臼, 逐步建构起包含全民健身、奥运战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新型竞赛伦理。而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 处在“后发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型的历史语境, 如何在西方体育竞赛文明强势渗透中建构文化主体性, 实现从被动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范式转换, 始终是武术竞赛研究的核心命题。面对中华武术体系庞杂、价值多元的客观现实, 如何以竞赛为支点撬动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 探索立足文化主体性的发展进路, 则构成该选题继续研究的深层挑战。

参考文献:

- [1] 中国武术协会.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专家调研座谈会在京举行[EB/OL]. (2024-03-30)[2025-03-13]. <https://www.wushu.com.cn/#/inform/informDetail?id=2293>
- [2] 中国武术协会. 体育总局武术中心关于公开征求《“十四五”武术项目发展规划》意见和建议的公告[EB/OL]. (2021-01-26)[2025-01-13]. <https://www.wushu.com.cn/#/inform/informDetail?id=904>
- [3] 杨建营. 深陷困境的中华武术的发展之路——邱丕相教授学术对话录[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4): 18-25.
- [4] 马明达, 马廉祯. 花拳入门错了一生[J]. 体育文化导刊, 2004(12): 71-73.
- [5] 杨建营. 以“扣子论”为切入点的新时代中华武术改革发展定位[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44(1): 145-156.
- [6] 邱丕相, 吉灿忠, 闻一鸣. “追美揖欧”式“中华新武术”的是与非[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1, 35(5): 61-63.
- [7] 杨建营. 从人类武技的文明化进程探析传统武术拳种的未来出路: 体系化传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J]. 体育科学, 2022, 42(9): 82-89.
- [8] 习近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 2022(17): 4-17.
- [9] 戴国斌, 曹可强, 郑国华, 等.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文化逻辑[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1): 15-21.
- [10] 熊晓正, 陈晋章, 林登辕. 从“土洋”对立到“建设民族本位体育”[J]. 体育文史, 1997(4): 13-17.
- [11] 李义君, 尹碧昌. “土洋体育之争”的回顾与启示[J]. 体育学刊, 2015, 22(5): 17-21.
- [12] 冯桂芬. 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84.
- [13] 胡适. 胡适全集·第4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667.
- [14]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278.
- [15] 梁启超. 中国之武士道·自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6] 菊井丛. 东方病人[N]. 国民报, 1901-01-16(3).
- [17] 杨念群.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3.
- [18] 佚名. 论体育[N]. 大公报, 1904-12-28(2).
- [19] 洪洪水. 中央国术馆国考花絮录[N]. 申报, 1928-10-20(21).
- [20] 佚名. 国术人员考试大纲及注意事项[N]. 申报, 1928-10-05(16).
- [21] 大公报社. 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N]. 大公报, 1932-08-07(2).
- [22] 张之江. 国术与体育: 异同之辨证[J]. 铁鸟, 1932(17): 3-4.
- [23] 程登科. 我们应否提倡中国的民族体育[J]. 勤奋体育月报, 1936(1): 18.
- [24] 范振兴. 我对于国术的所见[J]. 体育杂志, 1935, 1(3/4): 252-260.
- [25] 中央国术馆. 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M]. 南京: 大陆印书馆, 1931.
- [26] 陈奎生. 约述体育主义之诸说[J]. 体育研究与通讯, 1933, 1(3): 1-7.
- [27] 重峰. 如何能除祛武术家国术家们的病[J]. 求是月刊, 1935(1): 16-17.
- [28] 谭华. “东亚病夫”小史[J]. 体育文史, 1986(2): 48.
- [29] 编者. 大力士角技未成之原因[N]. 时报, 1909-12-5(6).

- [30] 编者. 中西大力士比较拳力之创举[N]. 时报, 1909-12-4(8).
- [31] 胡寄尘. 虞初近志[M]. 上海: 广益书局, 1913.
- [32] 佚名. 竞武场二次中外比武纪详[N]. 申报, 1923-8-13(18).
- [33] 张之江. 为国考再告国术家[J]. 国术周刊, 1934(106): 233.
- [34] 编者. 杂俎——各报评论[J]. 第一届国考特刊, 1928: 46.
- [35] 编者. 试卷选存[J]. 第一届国考特刊, 1928: 61-63.
- [36] 中央国术馆史编辑委员会. 中央国术馆史[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6.
- [37] 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69.
- [38] 梁启超. 新民说·第四节[N]. 新民丛报, 1902-02-02(2).
- [39] 二十八画生. 体育之研究[J]. 新青年, 1917, 3(2): 1-11.
- [40] 陈铁生.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国操记事本末[J]. 精武, 1924(42)10-39.
- [41] 褚民谊. 全运会中之国术比赛[J]. 时事月报, 1933, 9(5)337-339.
- [42] 编者. 本届全国运动会开幕概况[J]. 第五届全运专集, 1933(10): 6-7.
- [43] 大公报社. 参加世运会目的[N]. 大公报(天津), 1936-03-07(8).
- [44] 刘素娥. 奥运情缘: 一代武宗温敬铭的奥运传奇[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93.
- [45] 张震海. 近代中国武术发展概况[G]//体育史料. 第14辑.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9: 51.
- [46] 申报社. 我参加世运国术表演博得荣誉[N]. 申报, 1936-09-10(6).
- [47] 黄贵. 张之洞幼儿体育思想及其近代价值[J]. 体育学刊, 2021, 28(3): 31-37.
- [48] 佚名. 童子团之特色[J]. 佛山精武月刊, 1925(1): 55.
- [49] 中央国术馆. 国术考试细则[J]. 中央第二届国术国考专刊, 1934.

